

第六部

重 建



九日文学网
www.krzzjin.com

九日文書
www.krzzjin.com

第十七章 设计成长

占领开始时，大多数美国人，包括麦克阿瑟在内，都认为占领期将 525 不会且不应超过 3 年。可是 3 年过后，占领期才过了一半，而当时很多日本人显然已经厌倦了外国的统治。最高司令官依然收到仰慕者的来信，“和平”的理想依然可贵，“民主”依然是判断良性社会的试金石，然而征服者，尽管还握有非凡的权力，却已经成为日本拥挤的政治版图上的利益集团之一而已。

这种转变，并非只是发生在被征服者的意识当中。出于冷战的考虑，美国人开始放弃当初的许多“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理想。然而在 1945 年，这些理想在战败的日本民众看来，曾经是那么的超乎预期而又鼓舞人心。在此转变的过程中，美国人日益公然与日本社会中的保守势力甚至是右翼势力结盟，其中包括那些与这场失败的战争切身相关者。曾因战犯嫌疑被捕的人士被撤销起诉。经济大权重新回到大资本家和中央官僚的掌握之中。禁止担任公职的政治家和其他战时的领导人逐步得到“赦免”。而与此相反，激进的左翼遭到“赤狩”。无论是自上而下、526 自下而上，或是源于任何其他地方的真正的民主改革的想法，就如同老话说的那样，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梦。在占领结束之前，日本媒体已将这一戏剧性的方针变化称为“逆流”¹。

过去的舆论曾经欢呼美国人对“草根”民主的贡献，现在的民意测验则传达出国民显著的失望情绪。1948 年，当被问及是否相信国家正朝“好的方向”前进时，大多数日本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到了 1949 年，大多数人的回答则是否定的。1949 年初，确实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达

了对日本可能重新陷入战争的不安。²

曾经被胜利者和战败者如此小心翼翼地共同培育的和平梦想，突如其来地，在这个前同盟国之间、乃至同盟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相互纷争较量的世界上，看上去其实如此不堪一击。尽管书报检查制度经常过滤公众新闻，但这种做法只会使对冷战现实的觉醒更具冲击力。欧洲国家对东南亚重新实行殖民统治的野蛮企图，苏联在东欧的暴力镇压，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惊人胜利，恐怖的核军备竞赛的开场，所有这些都不是梦，而是梦魇般的现实。

“哦，出错了！”

1950年6月25日，战争在邻近的朝鲜战场爆发。而美国，仅仅在强制日本实施“和平宪法”4年之后，遽然强行对日进行再军备，同时美国购置战争关联物资为日本贫血的经济输血。突然之间，一切都以意料不到的、令人心力交瘁的方式好转——和恶化。占领期还将要持续近两年，但是先前征服者和战败者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占领”已经结束。朝鲜战争宣告了一个新世界的到来。而日本，无论愿意与否，自从战败后第一次成了这个世界明确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逐渐展现的不祥的氛围中，有时细小的事件呈现出极大的象征意味。1948年，名校东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因盗窃罪被捕。这桩罪行本身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犯罪人愤世嫉俗的自我辩护却引人注目。他说：“在当今社会中，无法判定什么是犯罪。”此时正是东京审判渐近尾声之际。对当时流行的《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词典的编者而言，这看来正是诠释“混乱与虚无”的绝佳例证。³对于这种玩世不恭，很快就会出现更多深刻洗练的表达。譬如黑泽明导演的与日俱增的幽暗暧昧的影片，其巅峰之作是1950年结构精妙的“相对的真实”的《罗生门》。

1950年9月，一对莽撞的年轻人向新闻界说了一句简单的话，引发了一场更为轰动的事件。当时一名在日本大学当司机的年轻男子，因偷窃大学基金被捕。他将偷来的钱与他18岁的女友（一位教授的女儿）挥霍一空。当被捕之时，他的回答“哦，出错了！”（Oh, Mistake!）很快成为占领期最著名的一句英语。原来，这个窃贼和他的情人都是好莱坞黑帮片的狂热爱好者，他们说着混杂日语和蹩脚英语的古怪语言，除

了物质消费和性的快乐之外，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对自己轻率的犯罪也毫无悔恨之意。社会评论家争相将他们作为战后年轻人无道德意识的象征，然而这句使人难忘的话却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共鸣。在一个人人都争着改弦易辙的世界里，近些年来的往事，无论战争还是占领，都越来越容易被看作只是个错误而已。⁴

对傲慢自负的美国人存在的厌烦，随着书报检查的趋缓，引发了大众文化中温和的反革命潮流。在流行歌曲中，轻浮絮叨的歌词盛行，曾与新的喜悦感和活力结合在一起的喧闹的美国摇摆舞音乐风格，让位给了传统的感伤格调。从 1949 年起，词曲中的支配情绪是徘徊、孤寂、放浪以及满溢无可慰藉的渴望的乡愁。这种苦乐参半的放纵情绪的魅力偶像，是早熟的少女歌手美空云雀。美空生于 1937 年，由演唱爵士乐一跃成名，却成了占领结束前“本土”感伤情绪的代表歌手。⁵

在此时，传统的チャンバラ（时代剧）重新回到了舞台。同时中世纪的传奇武士物语和小说开始重新出现在书店里，以吉川英治自 1948 年开始的 4 部大热的畅销书为代表。甚至是进入畅销书排行榜的翻译作品，也反映出新的保守主义倾向，其中包括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对美国太平洋战斗灼人的、批判性的描绘。玛格丽特·米歇尔（Margaret Mitchell）1936 年发表的空前的流行佳作《风と共に去りぬ》（*Gone with the Wind*，中译名《飘》），自 1949 年起的两年间，位居“十大”排行榜之列。不需要多少想象力，读者就能够在对战败的南部邦联的描绘中读出日本自身的命运。与优雅时代“随风而逝”的浪漫追忆相对照的，是战争蹂躏的土地的兴衰、被入侵的北方佬荼毒并重新探索定位的战后社会。甚至是米歇尔小说中对照鲜明的两位女主人公，也可以看作是日本镜像中的人物：贞洁、顺从、家庭型的韩媚兰与务实、投机、物欲的郝思嘉。牺牲、生存的奋斗，以及郝思嘉反抗的誓言“我永远不要再挨饿”，这一切的确使米歇尔的美国南方传奇看起来十分眼熟。⁶

真的解放和草根民主之梦的终结，在一本少儿读本的流行小册子的命运中有更为直接的反映。庆应大学教授浅井清在热情与理想主义的冲动之下，写了这本《あたらしい宪法のはなし》（《新宪法的故事》），于 1947 年出版，并被广泛使用为中学一年级社会课的教科书。这册课本

上说，新宪法与明治宪法不同，反映的是日本国民的意志。宪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是：国际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主权在民，三者相互关联。日本放弃战争意味着，今后日本绝不再拥有陆、海、空军。课本所附的全页插图，描绘了军备物资在“放弃战争”的大釜中销熔，从中产出的是和平国家的奇妙建筑、列车、商船、消防车和通信塔。这本小册子还强调自由和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

尽管教育制度仍然是在美国名义上的监督之下，浅井的小册子仍然于 1950 年被文部省降格为辅助读本，到 1951 年被彻底弃用。它也不可能有别的命运。此时的日本，不仅在美国鹰的卵翼下组织新的军队，而且终于开始着手经济复兴，但这是全面依附于为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提供“特需”服务的军需繁荣。⁷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哦，出错了”哲学最热心的信奉者，实际上是那些华盛顿和东京 529 的政策制定者们。因为经济政策中优先考虑事项的转换，意味着对占领开始时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一项最基本指令的否定。这项指令规定，将军的最高权限延伸“到经济领域的所有事项”，SCAP 将“不承担日本经济复兴或增强日本经济的任何责任”。这一方针背后的秘密计划文件确实包含惩罚的意图。国务—陆军—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的一份早期文件明言，“日本的困境是其自身行动的直接结果，同盟国将不承担修复损失的责任”。⁸ 直到 1948 年，与这些指示相一致，将军属下的经济官僚，其职能主要限定于惩罚的、改革的任务，如指定担当赔偿的工场、指导财阀持株会社的解体，制定财经界领导人的肃清名单，确定需要分割的“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以确保经济民主，以及组织农地改革并废除地主制度。尽管美国最终提供了大约 2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但大部分的援助都是为防范经济困境和社会不安定所必需的粮食和物资。⁹

在被占领的德国，盟军司令部将劳动、金融和经济职责分散到不同的部门。在日本，这三大领域的指挥监督权以及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控制，都合并在单独的经济科学局（E. S. S.）治下。经济科学局雇佣有大约五百名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原工商经营者，并监督大藏、劳动和商工三省以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日本银行和日本政府新设立的经济安定本

部。占领当局保留了日本“总力战”战时总动员过程中引入的大部分经济统治机制。必要时，他们甚至推进或认可比战时政策更激进的控制。直到占领临近终结，E. S. S. 还对日本的通商实行“中央集权的与独裁的”控制。华盛顿派来的高层顾问使团的建议，对强化这种上意下达的决策的制度化发挥了影响力。¹⁰

日本长期的战时动员体制的一个惊人后果，是资本高度集中于一小撮财阀手中。占领当局挑选了 10 个企业共同体作为详细审查的对象。其中 4 个有名的“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加上 6 个与军 530 部密切合作获得支配地位的“新兴财阀”（浅野、古河、日产、大仓、野村、中岛）。到战争结束时，“四大财阀”的投资份额从 1937 年的 10% 增长到 25%。1945 年，十大企业共同体总共控制矿业、机械、造船和化学领域 49% 的投资资本，银行业的 50%，保险业的 60% 以及航运业的 61%。¹¹

尽管战争导致了资本集中和成长，大企业的领导者却普遍乐于看到战争的终结。他们失去了海外的投资，国内资产的大部分埋在了瓦砾之中，而这只是他们欢迎终战的一半原因。多数大资本家已经将战争视为对抗内敌的生存斗争，也就是说，对抗军国主义者和经济官僚对民间部门实行完全的国家控制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于是，被资本主义的真正拥护者所占领，乍看起来是有利的形势变化，尤其是对战前与英美人有私人和生意往来的许多经营者而言。

这样的情绪在工商界是得到公开承认的。天皇玉音放送两天之后，最大的财阀三井的管理层集会，对在美国人的统治下转入和平生产的前景信心十足。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江户英雄所说，大家一致同意“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恶劣地对待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感到庆幸，毕竟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不是曾经批判三井“和平主义、自由主义和亲美主义”么？在占领军登陆之前不久，实业界首脑的秘密会议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一家巨型钢铁企业的社长，哈佛大学毕业生浅野良三竟然以英语失口说出：“我们的朋友就要来了。”他叫嚷说，由美国人率队占领是日本的幸运，这甚至可能为日本提供机会“奋斗以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多数工商界首脑都具有这种天真的乐观。另一位与会的经营者回忆，“我们从未梦想到财阀会被解体或是我们的领导者将被

清算。”¹²

尽管资本家比经济官僚可能更欢迎征服者的到来，二者却都没有为
531 逼近的战败准备好具体的计划。在这点上，日本人退出战争与他们的宣
战同样茫然失措。1941年当日本袭击珍珠港时，军部和文官领导人都没有
有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或是眼前迫近的巨大冲突的可能性进行认真的长
期预测。当时，东条首相借矗立在断崖绝壁上的京都清水寺设譬说，
“有时候，人不得不跳下清水的舞台”。而当战争结束时，精英人士暴露
出对未来也同样缺乏计划性。只有少数几人认真考虑过如何从战时经济
转向和平经济，或是和平经济将会是如何面目。官僚、实业家和政治家
似乎仍然处于“清水的舞台”的妄想之中：就像是倒放的影片，他们将
会重新跃上清水的舞台。无论如何，事情将会自行解决。

实际上迎接天皇败战广播的大多数行动是狂乱而破坏性的。私人承
包商手中的军用储备和生产资料，要么被隐匿起来，要么直接运到了黑
市。陆军、海军和军需省官员立即开始提出巨款，支付承包商或是充实
自己和亲朋好友的腰包。大藏省和日本中央银行成了印钞机，巨量发行
油墨未干的新纸币，为数百万失业工人和复员军人提供遣散费。同时，
为缓解民众焦虑，战时的个人储蓄账户提款限制解除。认真的簿记制度
被放弃，记录被故意销毁。结果是财政和经济混乱与极端的通货膨胀开
始，最终导致经济枯竭。¹³

对于大企业的领导者，这样的沉痛打击似乎并不严重。瓦解他们士
气的冲击，不是战败的混乱，而是战胜国存心惩罚和改革的经济政策。
当浅野良三这样的经营者自信地谈起他们的美国“朋友”时，他们想到
的是战前认识的保守商人和喜好社交的外交官。对当初占领政策影响如
此之大的罗斯福新政式的改革主义和反托拉斯热情，则完全超乎他们
的梦想。譬如，为迎接占领当局的到来，三井雄心勃勃地计划设立“三井
复兴事业公社”。他们解释说，这项新事业通过开展住宅建设和旨在扩
532 大耕地的农地开垦，确保三井员工和子公司维持继续工作，必要时赤字
经营也在所不惜。当SCAP官员将其作为混淆财阀战争责任的企图加以
拒绝时，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经济科学局的第一任局长——一位前
百货商店的经营者，他坦承自己既弄不懂日本人的心理又不明白日本的
“商业结构”，当他命令解散三井持株会社时，日本方面则感到无以言表

的委屈愤恨。¹⁴

正式投降后的第二周，由经济团体的主要代表提交给商工省的申报书同样有着一厢情愿的意味。无视无条件投降的严酷事实，申报书强调“日本以完全自主的态度”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并敦促政府与战胜国坚决“交涉”，确保日本人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这些写申报书的财经首脑们假定，为支付战争赔偿金，日本将被鼓励再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并恢复在全亚洲的海外事业与贸易。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之一。¹⁵同样乐观的工厂军转民生产的提案持续推出，直到12月初，美国赔偿事务发言人埃德温·鲍莱（Edwin Pauley）发表了令人心寒的声明，明确指出美国人对处理掉这些工厂作为赔偿，比让它们转产日本国内消费物资更为关注。基于美国当初的这些劝告，约1100个大企业被指定赔偿，主要集中于化学和重工业领域。其中的一些企业被允许继续民需生产，但必须随时准备按照指示停业。另外的企业被迫闲置停产。直到1950年底，多数指定企业一直处于这种不明确的状态之中。¹⁶

至于反垄断任务，SCAP迅速行动，确定了解散财阀持株会社和排除财阀家族成员任主要股东和公务员职位的政策。另一方面，拖延实施更广泛的“排除经济集中”政策，将大规模的生产设施置于不确定状态达三四年之久。对战时企业干部的“经济清洗”一直延迟到1947年1月，最终导致超过1500人辞职或被驱逐。同年7月，三井物业和三菱商事两大商事会社被指令解体。直到12月，国会受理并通过了基本的《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投降两年半之后，1948年2月，依照此法律 533 可能被解体的325个大公司的名单终于公布。此时，经济政策的“逆流”已经占据优势，此后数月间大多数指定公司被从此名单排除。“排除集中”行动结束于1949年8月，最终只有11家企业被命令解体。正如战后关于企业经营的一份大规模调查报告指出，这些状况毫不意外地导致了大企业经营者“生产意愿”的急剧减退。¹⁷

经济混乱的确以某种未曾预料的方式，支持着改革并激励创新精神。恶性通货膨胀大幅减少了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并使SCAP能以实际上近乎没收的方式，剥夺大地主的土地和解散家族保有的持株会社。¹⁸同时，大企业被悲观主义和消极气氛所笼罩，为中小型企业带来了创业的意愿。由于经营灵活和被指定赔偿或解体的危险不大，中小企业能够创

造性地应对战后的危机。

在战败的废墟中繁荣崛起的多数中小企业，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它们中一些企业的创新产品，其成功颇具传奇色彩。投降一年后，《东京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炸弹再生变手炉》的文章，详述了以前的军需生产者如何改造生产线满足和平时期要求的事迹。标题中的手炉指的是传统的烧木炭的火钵，现在是由除去弹头的炮弹外壳架在尾翼上制成。报上这类转换利用的长目录中还包括，弹药箱制成的米柜、小口径炮弹壳制成的茶筒。先前用于探照灯的反射镜制造商，现在生产窗玻璃和玻璃灯罩。一位生产战斗机活塞的分包商，改装其产品用于灌溉型抽水机。¹⁹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不时闪现出战后经济中标志性的企业名字。坦克部件和战舰船锚的生产者小松制作所社长，由看到美国推土机平整机场场地获得灵感，就将推土机作为重建公司的产品。战后成功的相机制造商佳能（Canon）和尼康（Nikon）曾是军用光学仪器制造商。1946年，战时曾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本田宗一郎，开始将军用通讯设备使用的小型发动机装到自行车上。这种轻型摩托在小商店老板和黑市小商贩中间大受欢迎，导致了1949年名为“梦幻号”的摩托车上市，并标志着本田技研工业帝国的发端。战后许多成功的电子工业会社，其前身多为制造军用通讯设备的中等规模的公司。投降后数周内，此类公司的一位前雇员井深大，与几位同事合作生产一种受欢迎的装置，将短波广播转换为常规频率的广播，为索尼（Sony）公司奠定了基石。²⁰

SCAP 以有意和无意的方式，激励着特定领域的创业意愿。他们优先考虑的是生产纺织品、化肥、电气产品的部门。美国兵的需求，不仅推进了三得利（Suntory）威士忌公司的成长，还促进了佳能与后来的尼康公司的销售和声誉。占领军还偶然帮助了建筑和陶瓷产业的再生。SCAP 要求日本政府支付维持占领军所需的巨额“终战处理费”，约有 50% 成了建设费用（包括抽水马桶、洗涤槽、瓷砖等等），为一大群承包商提供了职业。日本人很快开始在全国各地谈判获取 SCAP 的建筑合同，他们善于将外语拿来为我所用，因为合同主要靠“三 P”获得：请愿（petitions）、宴会（parties）和礼物（presents）。²¹

然而，这种革新的创业活动对恢复经济活力还远远不够，于是政府

很快感到有必要确立和促进特定的战略优先产业。SCAP 对此的支持值得注目。1947 年初，麦克阿瑟本人竟然告诉日本首相，执行“全面经济阵线的统一行动”至关重要。正如在东京的同盟国对日理事会的澳大利亚代表 W·麦克马洪·鲍尔（W. Macmahon Ball）所解释，这意味着“SCAP 明确声明，现状下‘自由企业’应当被管制经济所取代是至关重要的”。到最高司令官发布此命令之时，日本政府早已致力于一项名为“倾斜生产方式”的干涉计划。²²

倾斜生产方式作为不同思想信念的经济学家的思想产物，得到了超越党派的广泛支持。本质上，它基于三足鼎立的措施：将劳动力和稀少的原材料分配到主要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由政府直接补助；通过新设立的复兴金融金库（RFB）发放政策诱导贷款。这样的产业目标设定为通过引导资源流向最基础的能源生产（煤炭以及随后的电力）和最关键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钢铁以及次要一些的化肥），刺激经济的全面复苏。造船和纺织由于对未来的出口恢复至关重要，也受到了优先对待。到 1949 年，这 6 大指标部门约四分之一的外部资金，都通过复兴金融金库由政府供给，仅 97 家公司就获得了 87% 的 RFB 贷款。²³

这为贪污受贿提供了便利之机。实业家、官僚、政治家毫不迟疑地滥用职权。贿赂带来资金，部分资金反过来又成为礼金和将来的贿赂。从大煤矿经营者流向保守系政治家的大笔资金尤其显著，违法资金流向四面八方，甚至沾染了 GHQ 本身。1948 年“昭和电工事件”的曝光，使这一问题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引起了国民的关注。事件揭露出一家化肥公司在获得 RFB 巨额融资的过程中打造的巨大的贪污网。这一丑闻最初于 1948 年 4 月被新闻界曝光，导致了 10 月芦田均内阁的垮台。到年底，事件导致 64 位权势人物被捕，包括前首相芦田均本人、前大藏相（现任经济稳定本部长官）、商工省和农林省高官、主要银行经营者、两大保守党有名的政治家以及一位社会党高级干部（因接受贿赂平息国会对此事件的调查被捕）。这件丑闻内幕如此黑暗，以至难以完全查明，诉讼过程拖延了 13 年之久。但它具有黑幕故事爱好者期盼的一切因素：派系斗争、黑市交易、艺伎情妇、周旋于企业干部和 GHQ 高官之间的上流夫人以及泄露 GHQ 高官“招待费”暧昧账目的双重账簿。实质上，复兴金融金库的滥用职权，继终战时的掠夺和隐匿物资之后，成为大规

模贪污腐败的新舞台。²⁴

然而，渎职腐败只是倾斜生产方式的副产品而已。到 1949 年，指定产业的生产得到了相当充分的提高，而在此更为明确的状况之下，
536 隐匿物资开始重新回流到生产环节。但是“偏重”方针的代价也显而易见。通货膨胀毫无衰退迹象，当日本银行成为复兴金融金库债券的主要承买人，从而增加了日元钞票的发行时，“复金通货膨胀”成了令人生厌的新名词。同时，未受倾斜的产业遭受资金枯竭的困扰。各种瓶颈突现，甚至是对于煤炭、钢铁运输具有决定重要性的铁路运输部门也不例外。中小型企业遭遇显著困境，失去了某些竞争优势。庶民继续经受薪金—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因而劳动争议大增。到 1948 年中期，倾斜生产方式的前提受到质疑。此意见认为，“通过增加生产抑止通货膨胀的计划，应当变更为通过抑止通货膨胀增加生产的计划”。²⁵

随着方针政策的变动，倾斜生产方式很快相应地淡出了历史舞台，仅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如此，但它作为战后最初的宏观政策，其遗产却影响深远。它集中关注基础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开创了战后对制定最高产业政策的崇拜，嫁接和融合了多种经济思想体系，促进了政府和大企业更加紧密的结合。²⁶ 它为巨额资金的再整合与经济计划的新舞台奠定了基础。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在倾斜生产方式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日本决策者对日本经济将来的设想与战胜国的设计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人，即使在转而关注促进日本重建之时，也有考虑将原有的日本经济去势化的倾向。也就是说，是一个切断庞大的军需生产，转而生产出口廉价杂货物品（陶器、玻璃器皿、雕塑和玩具等），“东方”特产（丝绸和茶叶），用进口原材料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品、纸制品、简单的电气制品等）的贸易国。依照这种见解，新的日本，应当类似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经济情形，而非驱动经济为全面战争服务的时代。

当然，情况会有变化。战前能够使日本渗透和扰乱外国市场的廉价
537 出口商品的“社会倾销”，将会被消除。事实上，这一直是占领当局经济改革政策的目标之一，包括土地改革和劳动改革。这种观点认为，通

过推行高工资、高收入和更为公平的财富分配来提高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将会产生更大的国内市场并抑止低价商品的海外倾销。无论美国人如何积极将重点移到复兴日本经济，甚至发布宣言称日本的命运是成为非共产亚洲的“工厂”，他们对日本经济的设想，一直充其量不过是根本上的二流经济。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未来市场主要是亚洲的欠发达国家，而非欧美国家。朝鲜战争开战前几天，在东京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轻率却有代表性地告诉大藏省的一位高官，日本应当考虑向美国出口鸡尾酒会餐巾纸这类的东西。4年后，当占领结束，日本由于朝鲜战争带来经济繁荣时，时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杜勒斯，仍然私下“坦率”告知日本领导人，日本“不应当期望开发出大的美国市场，因为日本人不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日本必须另外寻找出口市场”。²⁷

尽管日本的决策者经受了岁月的煎熬，他们从未真正认为日本是技术低劣产品的生产国。没人能够否认这次的战争是一场灾难。然而与美国人不同，日本分析者倾向于不以战前的经济而以战争中的进步为基准设计今后的规划。在他们眼中，始于1931年侵略满洲的“十五年战争”之最为显著的遗产，是在战时压力下重化学工业发生的革命，而庞大的技术人员、中层管理者和熟练工人集团的诞生，将会继续推进革命。未来繁荣的关键在于科学的推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掌握以及高附加值产业的生产。日本方面是没有人会关心鸡尾酒餐巾纸的。

在第一批美国人到来的前日，三菱财阀强有力的当家人岩崎小弥太，在致一位管理干部的信中对这一前景做了展望。他写道，重要的是要有“百年大计”（这是一句古老的中国成语），而不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最近正在考虑的是日本于战争中在技术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未来“与他国竞争”的唯一途径，其重点将在于“彻底的研究、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管理效率的提升”。9月初，全国最大的经营者团体的首脑们，在向商工省提交咨询申报书时，也表明了类似见解。²⁸

对基于先进技术的经济设想最直接的早期表述，出现在1946年3月外务省特别咨询委员会题为《日本经济战后重建的基本问题》报告的油印本草案中。这个委员会由包括经济学家和财经界首脑在内的20位委

员组成，在起草此报告之前集会讨论了约40次，并在翌年9月发表了足有一本书篇幅的最终版本。尽管从未被提升到官方政策的高度，这部长篇大论的研究成果对随后的决策而言，非常接近于长期的规划蓝图。²⁹

虽然这份报告强力支持占领军当局反封建、反军国主义的政策，但当谈到政治经济的基本问题时，报告仍然提出了有特色的独立道路主张。它承认战后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美国色彩”，但强调日本条件的特殊性，使任何对于经济民主化的外国模式的“机械套用”都不适宜。创造适合日本国情和亚洲特色的“新型民主”十分必要。³⁰

据咨询委员会的见解，世界趋势表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终结，世界“终于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或是控制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期”。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希望继续强调自由竞争，但即使是他们理想化的经济自由，实际上也“被计划所限制”。事实上，中央计划的重要性不仅可以在英国、苏联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中见出，就连身边的SCAP，对于粮食、贸易、失业救济和公共财政的各类事务，也要求“接二连三”地进行政府计划。³¹

战败后，日本的全部生产结构“就像巨大的车轮停止转动”而处于539静止状态。难题在于通过以最合理的方式调动巨额资本让车轮重新转动。尽管咨询委员会批判财阀，支持占领当局解散“垄断资本”的经济障碍的计划，但它指出财阀曾在积累资本、扩大贸易、推进技术革新和促进重化工业成长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财阀衰败的今天，显而易见“民主政府本身可能不得不承担起同样的使命”。³²

咨询委员会认为，在战后的世界经济中日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美国的支配地位。实际上，日本将从这里获益良多。但是一旦日本恢复主权，避免“经济殖民地化”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可以料想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将会成为纺织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夺走日本的传统市场。于是，日本别无选择，只有另觅出口领域。也就是说，从事高附加值同时又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将会减少，需要增加更多的技术优势。³³

对此中心议题，报告书阐释得相当明确。尽管像茶、生丝、纺织品等传统的出口产品仍旧重要，将来日本不得不“很大程度上依赖机械和

化学产品的输出”，包括电气和通讯设备、采矿机械和农业机械、铁路车辆、仪表和其他精密仪器、科学和光学机器、钟表、自行车和机动车以及各种化学制品。报告带点儿讽刺意味地宣称，这些产业是战争经济遗赠给日本的“许多宝贵的教训和纪念”。³⁴

中央决策者的责任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因而其重要性被大大强调。新官僚们将确保为全国的利益服务而进行生产，承担迄今为止由财阀履行的多种职责，为有价值的企业提供贷款，促进中小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采取政策防范基础工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并最大限度地维持就业稳定（尤其是在因全球竞争而可能丧失工作机会的行业）。对外贸易将由国家计划和引导，公务员的“现代科学的管理”将取代旧体制下官僚的“封建”惯例。教育体制将被动员起来，培育具有统计才能和各种技能的学生，以满足高度工业化的社会的需求。³⁵

提交报告的咨询委员会中有名的几位委员，曾在战争期间由于公然同情左翼被大学免职，而且委员会的每个人都十分敏锐地感受到了当时思想动向、专家政治和科技进步的时代大趋势。他们致力于国内安定、国家繁荣和创造非军国主义经济的决心表露无遗。他们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信奉则是另外的问题。报告坦率地表示，对日本将来会采用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未有定论。无论如何，“渐进的社会化的经济”看来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值得期待。³⁶

尚待观察的，是这一切将如何成为现实。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1948年12月，华盛顿发布将在日本实施的经济安定九原则，而在两个月后，向东京派遣了引起广泛关注的使团，旨在恢复日本市场经济的活力。使团由独裁的“经济沙皇”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率领，直到朝鲜战争之前，他保守的“道奇路线”一直在日本推行得力。在道奇严格的指挥监督之下，九原则很快被定为“九戒”。在这种近乎宗教的氛围中，可怕的底特律银行家道奇先生实质上与麦克阿瑟一起，成了被占领日本的另一位上帝。至少起码日本现在发觉自己有了第三位统治者，就像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所挖苦的“帝国的会计师”。在道奇路线下，复兴金融金库贷款的龙头被关闭了，政府的财政

补助（至少在理论上）得到抑止，而内阁和国会不得不采取实现盈余的“超均衡”预算。

在“帝国会计师”的眼中，安定、经济复兴、自给自足这些新口号，都依赖于抑止通货膨胀和国内消费并促进出口活跃。为此，1949年4月道奇实际一手建立了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固定汇率，低估日元通过使世界上日本产品更廉价来刺激出口。一个月后，商工省与贸易厅合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通商产业省（MITI）。反垄断法被修订，以放松企业间互相持股、合并、兼任管理职务的限制。1949、1950年期间国会通过了基本法，赋予政府对贸易、通货和投资的强大控制权。与此同时，通过“赤狩”削弱了劳工运动，裁减了劳动法，企业的“合理化”导致数万名工人被解雇。³⁷

到1950年，道奇路线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代价是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的日本人，都日益感到不满。公共事业、福利和教育预算被削减，失业率上升，国内消费低迷，小型企业的破产增加，媒体开始集中关注小企业经营者自杀事件。而经济仍然处于停滞状态。部分是由于不利的国际形势，出口并未大幅增加。作为新的投资指标，耐用品的生产实际有所下降。股市下跌，人心更加惶惶不安。日本政府经济安定本部当初就批判过于紧缩的经济计划，现在则发出警告：“紧缩的恶性循环”正在侵蚀国家的产业基础并威胁到了社会安定。“安定恐慌”成了新的经济流行语。1950年4月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描述日本正处于“经济萧条的边缘”，并且称通货紧缩政策无异于“经济的自杀”。³⁸

道奇的政策是否会真的以经济萧条而告终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终结了安定恐慌，代之以美国的“特需”采购刺激出现的军需繁荣。现在正蹂躏日本前殖民地朝鲜的战争，正如吉田茂首相以及其他许多人乐于提到的那样，是“天佑神助”。考虑到仅在数年前和平和民主还被形容为“天赐的礼物”，这样的说法确实具有反讽意味。无论如何，至少这些礼物都是美国人所赐，而且深入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³⁹

多数产业部门受到了战争特需的刺激，先是金属制品，逐渐扩展到（大致顺序按支出额依次递减）石油和机油、织物和纤维制品、医药用

品、车辆、初级金属制品、原材料（除粮食和能源之外）、非金属矿产、电气机械和设备零件、服装鞋帽、建筑材料（包括管道设备和暖气装置）、木材和软木制品、非电气机械、饮料与烟草、纸张及纸制品、粮食以及橡胶制品。此外，美国人向日本求购弹药、轻武器和燃烧弹，尽管理论上这些产业仍在禁止之列。“特需”采购还扩展到向交战中的美军提供服务，其中修理坦克、飞机和军用车辆是最有利可图的工作。当然，此前日本工人被严格命令，不得将他们的技能再次用于此类直接的军事目的。日本人还为新涌人的美国军事人员及其家属建造、扩建设施并供应食品。美国人的私人消费和娱乐费用超出一般水平，也能带来一笔小小的财富。

据说，1950 年 6 月到 1953 年底，“特需”采购为日本带来约 23 亿美元，超过 1945 年到 1951 年间美国的援助总额，而且由于大多数以美元支付所以更具价值。即使是在 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与军事相关的采购仍然以“新特需”的名义继续进行，1954 到 1956 年间又额外带来 17.5 亿美元，约占这些年日本“出口”收入的一大半。这种长期延续的意外之财，使日本的进口能够大幅增加并使基础产业的生产规模倍增。

然而即便如此，也难以传达出军需繁荣的规模和本质，因为引发全球经济变化的朝鲜战争对日本十分有利。贸易方式被打乱、各国经济不景气的终结，都刺激了外国对日本产品的购买。此时，日本是唯一工业技术能力过剩的工业国家，购买机械制品的订单大量涌入。由于西欧的造船厂已经达到扩展限制，日本面临黄金契机发展自己的造船业使之成为最重要的出口部门。甚至是朝鲜战争的终结也有正面效应，因为日本被允许参与并受益于美国领导下的南朝鲜（韩国）的重建。

各种指标都显示出经济的猛烈复兴。停滞的股市从朝鲜战争爆发到 1951 年 12 月间上涨了 80%。朝鲜战争的前 8 个月，日本钢产量增长了约 38%，而钢材出口增长了三倍。汽车工业复兴受益于美国大批购买卡车和其他车辆。例如，丰田汽车的产量增加了 40%。丰田会社的社长后来说，“这些订单救了丰田的命。我既为我的公司感到高兴，又对我欣喜于别国的战争而怀有罪恶感”。³⁹

许多公司利用这次天赐良机不仅进口了更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而且升级改良设备并获取外国的先进技术。这是日本系统获得美国商业许

可和专利权的开端。这是获取巨大利益的交易，这是美国政府对其冷战盟友仍然脆弱的经济之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强力支持。军需景气还促进了 W·爱德华兹·戴明（W. Edwards Deming）提倡的“品质管理”方法在日本的普及。戴明是一位美国统计学者，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在美国本土的听众正日见稀少。1949 年，由于对道奇路线效果的悲观，日本中坚阶层的科学者和技术者为探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优势”，邀请戴明前往东京主持召开研讨班。戴明同意赴日演讲的条件是，确保能够左右有关生产过程的企业方针的管理者参与研讨。此后正如命运的安排，1950 年 7 月，就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戴明对一群日本的企业管理者发表了最初的讲演。如果没有战争的发生，戴明关于品质管理的福音也不可能会有如此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没有对日本制品的外国需求，也就没有可以适用其品质管理技术的大批量生产。这种绝望与机遇的偶然结合，使得戴明的日本崇拜者们将其有关品质管理的理念，整合到了新的生产循环和新的企业冒险的创始阶段，其影响力将持续数十年之久。⁴⁰

这是长期经济停滞之后的猛烈成长，但上层的许多经济策划者仍然将军需景气只不过看作是喜忧参半的天佑神助。他们为经济重新陷入军需依赖的前景而惊恐不安。他们警告说，由于主要是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受益，从而加剧了经济的“二重构造”，使经济景气受到威胁。新设立的经济审议厅发表的 1953 年《经济白皮书》，竟然提到了“特需之罪”。同时，普遍景气的积极影响无可否认。许多中小企业繁荣兴盛。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显著上涨。到 1952 年，普通民众开始感受到《白皮书》所谓的“消费景气”。粮食消费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廉价服装随处可以买到。基本的家用设施如冰箱和缝纫机更为普及，奢侈品如收音机和照相机也是如此。个人储蓄上升，从而使可用于产业投资的资金也增加了。⁴¹

这确实是个新世界。“生产疲弊”和“笋式生活”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甚至连道奇路线的苛酷记忆也几乎已经消失。然而道奇的遗产依然可观，无论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层面。崇拜道奇的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将道奇强迫性的紧缩政策坦率地描述为“无情的实施，无视战后三年半、历经两次民主选举的日本人的意愿”。当军需景

气将无情的实施者推离中心舞台，其经济沙皇的角色实质上被日本官僚机构集体继承。通商产业省就是此遗产的继承机构之一，达成了比日本战时总动员体制为顶点的经济独裁更加强力的经济权力集中化。大藏省是另一继承者，道奇通过它推行了大多数的指令。道奇与大藏大臣池田勇人的合作尤为紧密。池田是吉田的左膀右臂，后来也曾担任首相。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大藏省继续行使相对于其他省厅和国会的非凡特权，控制着预算和金融政策。正如科恩所指出，道奇也“在日本保守的大企业集团及其官界和政界同盟者与美国政府的高官之间，缔结了战后最初的沟通渠道。从那时起，日本的保守主义者就跟美国的权力顶层接上了头”。日本大企业的领导者当然等待了不止3年，但是他们曾经期待的美国朋友终于到来了。⁴²

战后日本经济的“特质”，主要是在道奇路线的动荡岁月和军需景气时期形成的。资本主义旗开得胜，解决了1946年外务省咨询委员会遗留的问题。这是以资本高度集中（这令决策者们悬心不已）并高度容忍官僚政治干预（这是他们乐于见到的）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对这些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少数几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巨大成长的民间“都市银行”，通常与各种财阀关联紧密。尽管美国的反托拉斯人士认定这些巨大的银行造成了“异乎寻常的严重问题”，但是由于金融部门逃避 545 初期的改革，实际上未被触及。当道奇停止经由复兴金融金库对重点产业的融资时，这些商业银行转而成为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很快发放了超出自身保证金额的贷款，并主要通过向日本银行借款弥补差额。“过剩融资”及时成为了标准程序，得到各种财政手段的支持，增强了中央对银行的影响力。同时，过剩融资加速重新巩固了产业与金融间的亲密关系，有时是延续败战前建立起来的家族关系，有时则是新的结合。⁴³

在军需景气归于沉寂后不久，经济科学部以前的一位敏锐的经济学家马丁·布朗芬布伦纳（Martin Bronfenbrenner）观察到，主要都市银行取代解体的持株会社，“成为财阀的神经中枢”。⁴⁴这种发展预告了由所谓“系列”支配的独特的战后体系的出现。“系列”这一古老的词汇，突然之间获得了特定的、强力的经济内涵。系列是商业和制造业企业的强大集团，实质上取代了（而非废除了）以前长期支配经济的以财阀为

中心的工业·金融资本集结。到 1950 年代初，六大主要经济集团出现，皆以都市银行为中心：三井、三菱、住友、富士、第一、三和。除三和之外的系列，都是旧财阀的再编和重新集合。⁴⁵

这并非是战前日本的复归。经济的大部分保留在这些集团之外。这些系列本身也与败战前家族支配的持株会社控制的财阀帝国具有显著的不同。与以前财阀俨然的金字塔构造不同，系列内的关系更加横向、开放，更具内部竞争性。家族世袭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股份持有更加多样化。系列内的银行与外界做生意，系列所属的企业也可以与外间的银行往来。通常，这样的战后企业比过去更加依赖国有资金（和国家的指令）。⁴⁶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将被证明比先前财阀支配的经济更加灵活和具有竞争力，并在应对全球经济和技术挑战的能力方面

546 超乎任何人的想象。然而在当时，战败、占领与得自邻国战争的有污点的“天助神佑”的结合，似乎诞生的是奇妙的异形生物，即经济企划厅担忧地指出的“日本产业构造的畸形化”。⁴⁷这个生物既熟悉又陌生，既出乎意料又在计划之中，既脆弱又强大。它的问世，既是由日美两国间的合作产生，又是日本所独有的产物，可以说，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不期而遇的结果。

此后数十年，当有关“日本威胁”的警报在美国和其他各国拉响，这种国家主导、系列支配的经济，其起源的两国性几乎已被遗忘。许多初期改革政策，诸如农地改革、鼓励劳工组织、财阀的持株会社解体等，被恰切地认为对活跃日本国内经济做出了贡献。然而与此同时，占领军的一些被忽略的行径，如未能推进银行组织分散化的不作为，也具有巨大的长期后果。再者，经济的“逆流”，其背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是确保日本成为强大的反共堡垒，而这必然导致对日本社会最为保守的、集团主义因素的扶持，以及美国人对这种“畸形”市场经济的持续培育。

美国人对这个新兴的重商主义国家最为显著的贡献，还远远未被觉察。它既非来自初期的改革政策，也非来自“逆流”进程本身，而是来自于占领军统治的运行机制。当占领军的政策目标从改革向重建急速转变时，经济仍然受到上层的严密控制。不少先前的改革推进派从中体味

到了苦涩的后果。利昂·霍勒曼（Leon Hollerman），一位受雇于经济科学部的经济学者，沮丧地总结说，尽管占领本身的任务是推进民主，但“它实际上部分地推进了官僚主义”，而且“其官僚主义的遗产主要在于经济方面”。这种占领时代的官僚构造，草率地建立在败战前日本固有的战时官僚制度之上，在1952年之后被日本人精明地延续下来，以守护他们新的资本主义。如此一来，正如霍勒曼所指出的，“SCAP通过向日本人‘返还’管理统治权对占领进行了消解，不仅天真地委让了自身的权限，而且无可奈何地目睹了对于自由主义的大国而言限制最为严格的外贸与外汇控制体系的制度化”。⁴⁸

注释：

- 1 笔者曾在“Occupied Japan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一文中，详述美方的逆流政策，参见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pp. 155 – 207。亦参见 Howard B. Schonberger,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 1945 – 1952*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 – 195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以及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2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 第二卷 占领政策の转换と讲和》(东京：青木书店，1990)，pp. 194 – 195。
- 3 《现代用语の基础知识》(1948年版，《自由国民》特别号14号)，东京：时局月报社，p. 131。
- 4 永沢道雄、刀祢馆正久、杂喉润《昭和の言葉》(东京：朝日ソノラマ，1989)，pp. 318 – 320；鹰桥信夫《昭和世相流行语辞典》(东京：旺文社，1986)，pp. 122 – 123。
- 5 鹰桥《昭和世相流行语辞典》，pp. 195 – 197。亦可参见1951年10月有关美空云雀的有趣文章，收入“*Shūkan Asahi*” no *Shōwa Shi* (Tokyo: Asahi Shimbunsha, 1989), vol. 2 (*Shōwa 20-nendai*), pp. 239 – 256。直到1989年去世，美空云雀一直是日本战后杰出的女歌手。她的个人魅力或曰风格，堪比 Judy Garland 或是 Edith Piaf。
- 6 盐泽实信《昭和ベストセラ一世相史》(东京：第三文明社，1988)，pp. 265 – 266。吉川英治在1948年有两本书进入“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亲鸾》与《新书太平记》。《亲鸾》一书是对十三世纪的佛教布道者亲鸾的研究（亲鸾也是启迪哲学家田边元进行本土性的“忏悔”思考的先哲）。《新书太平记》则是对十四世纪著名的战争记事新的再现。1949年，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十七世纪武士的传记，也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到1950年这部书仍然持续畅销。《亲

鸾》与《宫本武藏》都是吉川英治在1930年代连载的历史小说的再版。1951年，勤力笔耕的吉川英治又出版了一部畅销书《新平家物语》。这部著作是对日本经典战争记事的全新演绎，记述了十二世纪后期引领日本进入封建时代的南北朝内乱。1951年的“十大”畅销书，还包括谷崎润一郎以现代日语译出的十一世纪的经典之作《源氏物语》。

- 7 文部省《あたらしい憲法のはなし》（东京：文部省，1947）。这本小册子于1972年由日本平和委员会再版，作为占领初期的理想主义的例证，受到公众的关注。还可参见1994年5月2日《朝日新闻》登载的有关浅井与这本小册子的由来的文章。
- 8 “Basic Initial Post-Surrender Directive to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for the Occupation and Control of Japan”，November 3, 1945; Edwin M. Martin,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New Yor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8), pp. 113, 115.
- 9 关于美国的对日援助，参见本书第三章注12。
- 10 “中央集权的与独裁的”说法，来自于经济科学局的经济学家 Martin Bronfenbrenner；他对于占领时期经济政策的简要概括，参见 *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 (Tokyo: Kōdansha, 1983), vol. 2, pp. 154 – 158。如前所述，SCAP 过分大权独揽的情形，由另一位当事者切实地传达出来。参见 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日方对占领军通商管理的看法，参见野田一夫编《战后经营史》（东京：生产性本部，1965），pp. 294 – 302；这部大型文献提供了有关战后经营管理的许多切身的观察和体悟。
- 11 Mitsubishi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ed., *Mitsui-Mitsubishi-Sumitomo: Present Status of the Former Zaibatsu Enterprises* (Tokyo: Mitsubishi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1955), p. 6; 亦可参见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书中的图表, p. 120。
- 12 安藤良雄编《昭和政治经济史への證言》（东京：每日新闻社，1966），第3卷，p. 144；Kazuo Shibagaki, “Dissolution of Zaibatsu and De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Social Science Abstracts* 20 (Tokyo: Shakai Kagaku Kenkyūjo, Tokyo University, 1979), p. 21; Masahiro Hosoya, “Selected Aspects of the Zaibatsu Dissolution in Occupied Japan, 1945 – 1952: The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Zaibatsu Leaders, Jap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CAP Officials”,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December 1982), pp. 17 – 18. 这篇博士论文的前两章，分析日本企业高层对投降和 SCAP 早期要求财阀解体、经济分散的政策的反应，颇有见地。
- 13 有关内部资料，参见大藏省官房调查会金融财政实情研究会《战后财政史口述资料》，第1卷，第3、9条；此文献为大藏省汇编的占领期官员谈话录，未公开刊行。关于滥印纸币、物价飞涨之情形，参见 Fuji Bank (富士银行) 编, *Banking in Modern Japan*, *Fuji Bank Bulletin* special issue, vol. 11, no. 4 (1961; 纪念富士银行成立 80 周年特别号), p. 187；以及经济企画厅战后经济史编集室编《战后经济史（经济政策编）》（东京：大藏省印刷局，1960），p. 33。
- 14 Hosoya, pp. 19 – 23, 50 – 54. 经济科学局 (E. S. S.) 首任局长 Raymond C. Kramer 上校此举令三井会社高层大为震惊，对日本人恭聆天皇教诲投降、配合

美国占领军到来的“盲目顺从”态度造成重挫。

- 15 参见堀越祯三编《经济团体联合会十年史》（东京：经团连，1962），第1卷，pp. 4–11；Hosoya 前引文中亦有概括，pp. 27–32。这一提出咨问的团体发展为“经团连”，成为日本最强有力的大企业联合组织。
- 16 据野田编《战后经营史》（pp. 59–66），1950年5月1日共有844处工厂被指定赔偿（其中524家处于生产状态，320家被闲置），到1950年底莫名其妙增加到930处。关于赔偿问题，参见 Borden 前引书，pp. 71–83。占领期间，日本实际的赔偿从1947年5月开始，共有14000台工业机械被输送到亚洲各国。1952年占领终结。日本恢复主权后与各国交涉，达成以生产物方式进行赔偿的协议。
- 17 野田编《战后经营史》，p. 116。亦参见通产大臣官房调查课编《战后经济十年史》（东京：商工会馆出版部，1954），p. 14。有关财阀政策的基本英语文献，出自参与制定相关政策的 E. S. S. 前官员 Eleanor Hadley 之手，*Antitrust i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亦可参见 Hadley 关于“Zaibatsu”（财阀）和“Zaibatsu Dissolution”（财阀解体）的简明释义，*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 (Tokyo: Kodansha, 1983), vol. 8, pp. 361–366; Hadley, “From Deconcentration to Reverse Course”，收入 Robert Wolfe 编，*Americans as Proconsul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1944–1952*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4)，pp. 138–154; Shibagaki (1979)，pp. 1–60; Kozo Yamamura, *Economic Policy in Postwar Japan: Growth Versus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Holding Company Liquidation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Zaibatsu Dissolution* (Tokyo: July 10, 1951); 以及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GHQ, SCAP, “De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Part B of Reform of Business Enterprise, vol. 10，见 SCAP 未公开发表之 *History of the Nonmilitary Activities of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1952; 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此文献之缩微胶片)。
- 18 两位前 SCAP 内部人员对“没收”的评论，参见 Cohen 前引书，pp. 176–178; Hadley (1983)，p. 364。
- 19 野田编《战后经营史》，p. 162。
- 20 前引之《战后经营史》，pp. 42–44, 173–174, 192–195, 199–201。
- 21 前引之《战后经营史》，pp. 113, 120–122, 175–181, 185, 193–195。
- 22 参见 W. Macmahon Ball, *Japan: Enemy or Ally?* (New York: John Day, 1949)，书中引用了麦克阿瑟1947年3月22日致吉田茂的长信，pp. 60–63；亦参见 Leon Hollerm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trols in Occupied Japan”，*Journal of Asia Studies* 38.4 (August 1979): 708。
- 23 Laura Hein 在其书中对这些经济计划有精到的分析，参见 *Fueling Growth: The Energy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尤可参见 pp. 107–128。仅有少数公司获得 RFB 贷款的统计，参见 Dick K. Nanto, “The United States' Role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Recovery of Japan”，p. 236。此文为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12月）。有关 RFB 的贷款数据，参见有泽广巳、稻葉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东京：日本评论社，1966），第二卷“经济”，pp. 60–61；及 Fuji Bank,

Banking in Modern Japan, pp. 193 – 194。

- 24 SNNZ 8: 208 – 209; 野田编《战后经营史》，pp. 350 – 351；《战后史大事典》（东京：三省堂，1991），p. 435。当时日本各方猜测，“昭和电工事件”的曝光，是由 lloughby 将军在 SCAP 参谋二部首先发难的，其明确目的是败坏民政局的“激进”分子之声誉。
- 25 Fuji Bank, *Banking in Modern Japan*, p. 194; 1948 年 7 月 9 日 *Tokyo Times*, 引自 Jerome B. Cohen, *Japan's Economy in War and Reconstr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49), p. 447。关于倾斜生产方式的半官方的批判，参见经济企画厅编《战后经济史（经济政策编）》，pp. 44 – 47。
- 26 Hein 前引书中对这一点十分强调，pp. 124 – 128。
- 27 美国国务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Washington, 1985), 第 14 卷, 第 2 部分, pp. 1724 – 1725, 亦见于 p. 1693。“Workshop”(工厂)一词, 是由美国国务卿 Dean Acheson 在 1947 年 5 月鼓吹日德重建的著名演讲中提出的。Dulles 有关 “cocktail napkin”(鸡尾酒会用的餐巾纸) 的言辞是向渡边武说的, 参见渡边武的回忆录《占领下の日本財政覚え書き》(东京: 日本经济新闻社, 1966)。
- 28 岩崎小弥太传编集委员会编, 《岩崎小弥太传》(东京, 1957), pp. 382 – 383; 野田书中有所引用, pp. 23, 49。
- 29 此报告书于 1977 年出版英译本: Japa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Basic Problems for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Japanese Economy: Translation of a Report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ecial Survey Committee, September 1946*。此报告书起源于大来佐武郎 (一位成为经济学家的年轻工程师, 后来担任过日本外相) 的个人研究。报告书最终的定稿由大来佐武郎、后藤善之助、小田宽及并木正吉 4 位年轻干事执笔, 并木因为资历不足, 甚至未能列名委员。本书对此报告的概述, 皆以英译本为准, 并且对照日文原稿做了少许编辑改动。Laura Hein 对包括此报告书在内的日本战后规划有着详细研究; 除 *Fueling Growth* (尤其是第 5、6 章) 一书外, 还可参见她的论文, “In Search of Peace and Democracy: Japanese Economic Debate in Political Contex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3 (August 1994): 752 – 778, 以及 “Growth Versus Success: Japan's Economic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收入 Andrew Gordon 编,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99 – 122。
- 30 *Basic Problems*, pp. 53 – 59, 尤其是 pp. 54, 56。
- 31 *Basic Problems*, pp. 2 – 6, 64 – 65.
- 32 *Basic Problems*, pp. 43 – 44, 56 – 57.
- 33 *Basic Problems*, pp. 7, 52 – 53, 60 – 61.
- 34 *Basic Problems*, pp. 48, 60, 96 – 100。报告书称, 在战争动员过程中, 日本“有了自己制造精密机械、轴承、光学仪器、短波电信设备以及其他各种现代机械的经验。此外, 国家在真实需求的压力下, 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服兵役者和重工业劳动者。现在即便是在最偏远的乡村, 也能找到从大城市学习了车床操作技术回来的年轻人。只要今后竭尽努力, 这些条件将对建设和平的日本经济做出宝贵贡献”。

- 35 *Basic Problems*, pp. 56–59, 65–66, 89, 91–93, 133–134.
- 36 *Basic Problems*, pp. 58, 65。咨询委员会中，学识卓越的经济学家包括：有沢広巳、稻葉秀三、大内兵卫、东烟精一、中山伊知郎。
- 37 “九戒”（经济安定九原则）包含税制、金融、抑制资金、抑制物价、外贸汇兑、产业分配与输出奖励、国内原料的开发、粮食征收、紧缩均衡预算等内容。关于道奇路线及其影响，参见 Borden, pp. 92–102; Hein (1990), pp. 153–172; Theodore Cohen, 第 23 章; Fuji Bank 编, pp. 199–206; Nanto (1976); 以及 Tsuru Shigeto, *Japan's Capitalism: Creative Defeat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8–56。道奇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 Dower 的 *Empire and Aftermath* 一书中有所论述, pp. 274–275, 416–428。
- 38 日本流行的说法是“天助神佑”。有关朝鲜战争的另一流行语是“复苏灵药”。
- 39 1950 年 6 月到 1953 年的特需采购明细，参见通产大臣官房调查课编《战后经济十年史》pp. 78–79 之附录；此明细亦可用于比较不同部门之间的受益情形，此文献中的估值数据极为保守。亦可参见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东京：日本评论社, 1963), pp. 72–80; G. C. Allen, *Japan's Economic Recove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9–22, 95, 98, 203; Takafusa Nakamura,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Its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1), pp. 41–48; Tatsurō Uchino, *Japan's Postwar Economy: An Insider's View of Its History and Its Future*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3), pp. 55–62。丰田会社社长所言，见 Asahi Shimbun 编, *The Pacific Rivals* (Tokyo: Weatherhill, 1972), p. 193。
- 40 参见 W. Edwards Deming, “What Happened in Japan?”, *Industrial Quality Control* 24. 2 (August 1967): 89–93。Deming, “My View of Quality Control in Japan”, *Reports of Statistical Application Research* 22. 2 (June 1975): 73–80。后一期刊由日本经济技术连盟创办。日本经济连盟于 1950 年 7 月邀请 Deming 主办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为期 8 天的研讨班，并于翌年 12 月设立了著名的“Deming Prize”奖项；亦可参见日本经济连盟出版的一本小册子：Kenichi Koyanagi, *The Deming Prize* (1960)。Deming 曾是 SCAP 抽样检查技术顾问；继 1950 年的品质管理研讨班之后，Deming 于 1951、1952、1955、1960 以及 1965 年又相继举办了类似的研讨。此外，还可参见前引书 Hein (1993), pp. 109–110。
- 41 Uchino 前引书, pp. 73–75; 通产大臣官房调查课编,《战后经济十年史》, pp. 74, 422–434; Nakamura 前引书, p. 42。
- 42 Cohen 前引书, pp. 432, 441–442。经济学家与参与决策者都留重人，同样认为道奇的紧缩预算是最终强迫日本政府和国会接受的；参见 Tsuru Shigeto (都留重人) 前引书, p. 48。Schonberger 前引书对在幕后支持美方政界及新闻界政策逆转的日本民间游说团体进行了透彻分析, pp. 134–160。池田勇人作为 1960 年代初期的日本首相，是著名的“所得倍增计划”的设计者。
- 43 从通商产业省 1954 年的战后经济调查可以大致了解，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为改良道奇路线、刺激私营经济采取的各项财政措施，以及日本银行在推进过剩融资政策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参见通产大臣官房调查课编,《战后经济十年史》, pp. 22–23, 59–60, 315–322。商业银行向日本银行融资实际始于 1942 年，当时

日本向同盟国开战后中央银行的权限大增。Fuji Bank 编, pp. 157 – 161, 167。这是在 SCAP 统治下, 战时行为得到延续的又一例证。关于过剩融资政策, 参见通产大臣官房调查课编, 《战后经济十年史》, pp. 203 – 205, 208, 213 – 214, 220 – 224。亦可参见 Nakamura 前引书, p. 39。

- 44 Martin Bronfenbrenner, “Monopoly and Infla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 *Osaka Economic Papers* 3.2 (March 1995); 42 – 43.
- 45 Shibigaki 前引书, pp. 42 – 50。Teiichi Wada, “Zaibatsu Dissolution and Business Groupings”, *Waseda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2 (1980), pp. 13 – 17。三井、三菱、住友“系列”显然产生于旧有的“四大财阀”。富士银行集团属下的公司, 不仅与旧日的安田财阀(“四大”中最小的财阀)、而且与先前的浅野、日产和日立等财阀相关。第一集团除了拥有独立的企业商号之外, 还接收了从前吉河、川崎与藤山财阀名下的公司。在这些“系列”定名之前, 曾经多次改换名称。
- 46 Shibigaki (柴垣和夫) 前引书中对此问题有尖锐而有趣的论述, pp. 42 – 55。
- 47 小林《战后日本经济史》, p. 75。
- 48 参见前引之 Hollerm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trols”, pp. 707 – 719。Chalmers Johnson 开创性的研究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对这些课题进行了深入详实的研究。